

文化与文明互鉴

促进中智建交的非国家行为体： 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

[智] 莫妮卡·阿乌马达·菲格罗亚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有别于传统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艺术家的身份，与中国共筑合作的纽带，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并且形成了以政治使命感为特点的风格：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人权利而斗争。凭借这种政治使命感，他们融入国际社会当中，并促进了1970年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今日。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与巴勃罗·聂鲁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使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影响力，还因为他们是智利人民的杰出代表。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为了确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必须研究他们二人是如何拓展权力空间，让世界了解智利的；同时，还需要深入研究他们二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智关系 非国家行为体 何塞·万徒勒里
巴勃罗·聂鲁达

作者简介：莫妮卡·阿乌马达·菲格罗亚（Mónica Ahumada Figueroa），博士，智利圣地亚哥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6649（2017）01-0146-8

一 研究对象的背景

鉴于中智关系的重要性，研究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背景下中智两国关系开启之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因为在冷战时期，权力空间已经被当时的世界霸主美国和苏联所占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距遥远的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却启动了与中国的联系。

在整个 20 世纪，在拉美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都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各界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拉美希望探索出一条能够解决该地区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发展道路。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纷纷涌现，根据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解读，提出了新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国际范围内保持联系，组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网，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定位他们的组织，凭借着他们对国内外经验的理解推动国内讨论的深入。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智两国之间最初的联系和友谊主要归功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所开展的活动。

在这一场景之下，可以说正是这些极具个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在“软实力”^①的框架下，行使了他们的权力，成为双边关系的最初开拓者。他们是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开创者，其中，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与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萨尔瓦多·阿连德。让人称奇的是，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国度，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模式下，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成功地开启与中国的关系，并在随后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而在中国，两国关系的巩固是由国家行为体负责的。在冷战时期，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对于智利积极形象的建立和南美国家了解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两国相距遥远，费用高昂，旅行的可能性和建立两国之间的联系都受到了限制。行程很长，且只能通过苏联实现，由北方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再坐飞机到北京。智利壁画画家何塞·万徒勒里的女儿帕斯·万徒勒里（Paz Venturelli）是这样表述她父母 1952 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情形：“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幸亏俄罗斯农民帮我父亲搓揉身体，他才没有被冻死。一到达海参崴，他们就乘飞机去了北京。他们是中

^①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9, p. 64.

国革命胜利后最早到达中国的智利人……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我父亲想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他想成为一个见证人。我父母原本打算在中国只停留三个星期，但他们待了三个月后决定长期留下来，并将我从智利接过来，我1岁时到达中国，我们在那里住了16年。当时中国很少有外国人。我父亲见过周恩来总理，他们一见如故，用法语交谈……他们想打破美国的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封锁。不久，他们想在圣地亚哥建立一个智利—中国问题研究所。”^①

智利是位于南锥体地区的一个小国，因其边缘性地位，必须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在一体化方面，拉美其他国家是其主要的盟友。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小的人口规模并没有阻止智利在该地区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并将这种角色延伸到其他地区共同体当中。

考虑到上述背景，必须研究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被中国政府重视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个人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智友谊桥梁的建立？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画家、艺术家，是非国家行为体），更要归功于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敏感度和理解力。中国和智利同属边缘国家，由于其边缘性的政治地位和大量的贫困人口，需要扩展生存空间，并且在这层空间内表达他们亟须改变世界体系的诉求。

达夫妮·若斯兰（Daphné Josselin）和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在谈到世界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时指出：“冷战双方都在利用非国家行为体，与他们结盟，公开或者暗地里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无论是工会、学生组织、和平组织、友谊协会、人权组织，还是发展性的非政府组织，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们都成了武器。”^②可见，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齿轮传动装置上的一个零件，是非国家行为体从个人信念出发寻求新道路的一种践行。

二 何塞·万徒勒里：中智关系的建筑师

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年）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智利杰出的画

^① Paz Venturelli, “Unreleased Interview in Santiago”, Chile, January 7, 2016.

^② Daphné Josselin and William Wallace, *Non 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 6.

家，曾在智利国立中学学习，后进入智利大学美术学院深造。著名的墨西哥壁画家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为奇康市小学创作壁画期间，万徒勒里曾担任其助手。之后，万徒勒里开始致力于大型“公共壁画”的创作，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被人民大众欣赏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创作上的倾向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可以以一个画家和壁画家的身份，超越时代以及后来的艺术家，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可。

由于何塞·万徒勒里的艺术观及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1951年他曾以智利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柏林世界青年艺术节，并在那里与各个国家的代表共聚一堂。同年年底，他应邀前往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时赴会的还有从柏林出发的巴勃罗·聂鲁达和豪尔赫·阿马多（Jorge Amado）等人。在万徒勒里的传记中这样描述这一盛事：“各国代表齐赴盛会，鲜有人缺席。在一片欢呼声中，中国长征英雄代表团成员走到了舞台中央。代表们提议为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国家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和平委员会，并将总部设在北京。万徒勒里主动上前交谈，并且收到了访问中国的公开邀请。”^①万徒勒里积极参加文化界内的各种活动。在智利大使馆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合编的著作中，中国学者也记录了这一事件：“1952年5月，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中国艺术家进行交流，并且向中国媒体介绍了拉丁美洲人民和平运动的情况。”^②这是他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的起点，并且这种关系伴随了万徒勒里的一生。

这位智利画家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使他在中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由此加强了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系。在回顾中智两国双边关系的时候，何塞·万徒勒里显然是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代表。这种关系无论在私人友谊中，在中国对其家人的优厚招待中，还是在其艺术作品中，都在不断加深。但最重要的联系体现在他本人的政治倾向上，万徒勒里坚信中国人民建立的国家模式有必要在其他国家推广，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国智利。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奠定了其政治信仰的基础。此外，他还努力探索东方文化的价值，相信那些几千年来贯穿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信念的力量。

^① Luis Alberto Mansilla, *Hoy es Todavía. José Venturelli, una Biografía*, Santiago de Chile: LOM Ediciones, 2003, p. 59.

^② Jiang Shixue,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hino - chilenas en el Umbral de una Nueva Etapa de Desarrollo”, en *Chile y China: Reflexiones para una Agenda Integral*, Beijing, 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ontemporáneas de China y Embajada de Chile, 2006, p. 7.

何塞·万万徒勒里之所以能够融入中国社会，是因为他的家人也来到了中国，能够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与他协调一致。万徒勒里的妻子德利娅·巴劳纳（Delia Baraona）也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她是北京市第一位外籍西班牙语女教师，这在她与学生的照片和当时的报纸上都得到了反映。她的孙女马尔瓦（Malva）作为万徒勒里基金会的协调员，在2013年的一次受访中谈道：“迪莉娅在中国引入了西班牙语教学，她向中国学生教授西班牙语，并且为当时的中文杂志撰写文章。她曾经一度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她的女儿帕斯（Paz）被送去学习中国文化，帕斯在一所公立小学读书，就像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融入了中国社会。”^①

由于何塞·万万徒勒里的活动，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后，中智两国从1954年起就建立起来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他再度访问中国的史实也被记载在达格尼诺博士的《扬子江上的曙光》一书中，该书中叙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中国之旅。^② 1970年12月15号，万徒勒里作为阿连德政府的“使者”，推动两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建立了外交关系，使智利成为南美地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智利军事政变之后，万徒勒里被撤销智利护照。^③ 后来，他离开了中国，前往日内瓦定居。几年后，他肺病发作，不得不再次返回中国，并在那里接受了私人医生的诊治，最终于1988年9月17日病逝于北京。人们在医院里为其守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前去探望。^④ 万徒勒里的骨灰被送回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在那里举行了告别仪式。他的“象征性符号”地位使其成为中智双边关系的伟大建筑师。在由李昉和吴洪英主编的《中国与智利：外交四十年》的一书中（此书是为了纪念中智双边关系建立40周年而出版），作者曾深切地怀念他。^⑤

在此，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画家何塞·万万徒勒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当今的中国和智利是否还存在？多年来他的艺术作品在他所居住的

① Entrevista de Estudio Realizada a Malva Castillo Venturelli, Coordinadora Fundación José Venturelli y Gestora Cultural en Santiago de Chile, el 24 de abril de 2013.

② Eduardo Labarca, *Salvador Allende. Biografía Sentimental*, Santiago de Chile; Ed. Catalonia Santiago, 2007, p. 88.

③ Memoria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Chile (1973-2008).

④ Luis Alberto Mansilla, *Hoy es Todavía. José Venturelli, una Biografía*, Santiago de Chile; LOM Ediciones, 2003, p. 120.

⑤ Yun Tso Lee y Wu Hongying, *Chile y China, Cuarenta Años de Política Exterior*, Santiago de Chile; RIL Ed., 2011, p. 100.

国家中是否一直得到了保护？在 2016 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文化交流年的庆祝活动中，这一问题得到了答案。万徒勒里的艺术作品被陈列在上海艺术博物馆、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博物馆和南京的江苏艺术博物馆。展览中还增添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古巴保存下来的珍贵壁画，包括在哈瓦那自由酒店题为“团结”的壁画和在古巴卫生部大楼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他在欧洲的流亡生涯使得他在瑞士日内瓦创作了题为“玛德琳”（la Madelaine）的彩色玻璃窗画，并申报了文化遗产。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他最感兴趣的是为人权而战，这表现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智利和她的山脉》以及《她的人民》中。

三 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善于塑造国家形象的非国家行为体

20 世纪上半期，智利社会的文化生活局限在一群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或者投入到文学、艺术和音乐创作当中，或者融入世界革命洪流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他于 1924 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197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出生于特木科（Temuco）市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家庭，后来以诗人的身份进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法语教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欧洲作家（包括俄国作家）。

1927 年，他加入智利的外交官行列。他的第一个任职地是缅甸的仰光，之后他相继被派到斯里兰卡、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任职。他的“世界”在不断拓展。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使他增长了见识，结识了世界上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士。与当时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投身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他通过和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建立的关系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聂鲁达凭借其远见卓识，在国际文化圈内占有一席之地；漫长的外交生涯和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进步文化运动，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培养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锐性与智慧。他与毕加索、豪尔赫·阿马多、萧三等世界名人来往密切。他冒险参与国际和平大会的事实（捍卫国际和平的斗争是冷战时期重要的文化阵线之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员受到魏地拉政府的监视与追踪，他只能从智利秘密出发，于 1949 年 4 月中旬化

名来到巴黎，并且突然出现在第一届国际和平大会闭幕式的现场。他的朋友、智利作家博洛迪亚·泰特罗鲍姆曾这样描述这一事件：“1949年4月25日，星期一，于五天前开幕的世界和平大会将在当天举行闭幕仪式。仪式上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作家和政治人物，有来自中国的郭沫若和萧三，来自拉丁美洲的200多位代表，包括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和拉萨罗·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安东尼奥·伯恩，古巴的尼克拉斯·纪廉，巴西的豪尔赫·阿马多和卡约·帕尔多等人。埃尔维斯·法尔格是最后一场的主持人，他用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在结束这场讨论之前，我们邀请最后一位发言人讲话，这位将要发言的朋友几分钟之前才赶到会场，所以诸位还没能看到他，他是一位被追踪被迫害的文化人士，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①

巴勃罗·聂鲁达于1927年在缅甸仰光担任领事一职，这是其东亚和东南亚外交活动的起点。在那些年间，他取道上海的时候，第一次与中国有了直接的接触。24年后，聂鲁达于1951年从苏联出发正式访问中国，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颁发列宁和平奖。在回忆录中他曾这样描述：“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前往中国。踏进这趟传奇的列车，就犹如登上一艘在茫茫大海中驶向无边而神秘的空间的轮船一样。窗外是一片黄色。时间已过仲秋季节，举目所见的是那灰白色的桦树上花瓣似的黄色树叶。”^② 长途跋涉之后，聂鲁达抵达北京，在那里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作家艾青等人，一切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事件：“第二天，在列宁和平奖颁发仪式之后（当时被称作斯大林奖），我们在苏联大使馆用餐，出席宴会的除了获奖人之外，还有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③ 这个故事发生在庆祝革命胜利两周年的历史背景下。

巴勃罗·聂鲁达与中国作家的友谊之情日益加深，1954年，聂鲁达在圣地亚哥查思科那（Chascona）宅邸庆祝50岁生日，萧三和艾青从中国赶来为其贺寿。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聂鲁达多年来与世界各地人民建立的深厚友谊，使他成为文化圈内最知名的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不仅在智利国内，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之后，他收到了源源不断的邀请。数年后，他出席了在

^① Volodia Teitelboim, *Neruda*, Santiago de Chile: Editorial Sudamericana Chilena, 1996, p. 328.

^{②③} Pablo Neruda, *Confieso que he Vivido. Memoria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Planeta Argentina, 1992, p. 285, p. 290, p. 234.

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之后，取道昆明，在那座中国边境上的最大城市会见了以艾青为首的官方代表团，后沿着长江观赏景色，最后抵达南京。就这样，聂鲁达作为从智利远道而来的贵客和拉丁美洲文化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官方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1970—1973年），聂鲁达由于其漫长的外交官生涯和参与国际会议的丰富阅历，被派往智利驻法国使馆担任大使。这一切都与他强大的交际能力和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感相关。后来，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不得不返回智利。1973年9月23日，也就是军事政变几天之后，聂鲁达病逝于圣地亚哥。现在，他的遗产在聂鲁达基金会的经营管理之下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然而，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众多的世界友人，他们仍在怀念聂鲁达，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因为他是一位为了世界和平和正义而奋斗的勇士。聂鲁达与众不同的是，他能够通过他的诗歌展示他的才智。

四 余论

在这篇文章中，当分析由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推动的结构改革进程的时候，分析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尤其考虑到两人政治观点有差异。

在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个国家的政治立场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之间摇摆。聂鲁达总是靠近莫斯科制定的路线，而万徒勒里却总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动的革命运动，而这种无条件的忠诚使他被驱逐出智利共产党。他对中国的眷恋是建立在他和他的家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以及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见证的基础之上。难怪他会被毛泽东视为一个重要人物，并被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所接纳。而聂鲁达的情况不同，他仅仅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两位智利文化代表人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自问：万徒勒里、聂鲁达与阿连德一起首次在南美洲展示了中国的形象，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是否会产生像万徒勒里和聂鲁达这样的智利非国家行为体的人物？

（翻译 颜娟；责任编辑 高涵）